

※ 書目文獻 ※

朱維錚「中國史學史」課程筆記

史應勇^{*}

引 言

我作為一個史學科班出身的人，對於「中國史學史」這門課程並不陌生，它是歷史系的基本課程之一。何況本人在大學本科畢業前，為了考取碩士研究生，還專攻過一段「中國史學史」。但是，當我在陝西師範大學中國古代史專業碩士畢業八年後，又再次考取復旦大學中國古代史專業博士研究生，於一九九九年秋季的學期跟隨朱維錚先生重新系統聽受「中國史學史」課程時，我還是覺得這門課程相當耳目一新。因為：以往我所研學的「中國史學史」，主要內容只是歷史編纂學的發展史，而朱先生的「中國史學史」，卻在史學編纂形式與史學觀念之間的相關性方面，每每有獨到的新見解，頗為啟迪後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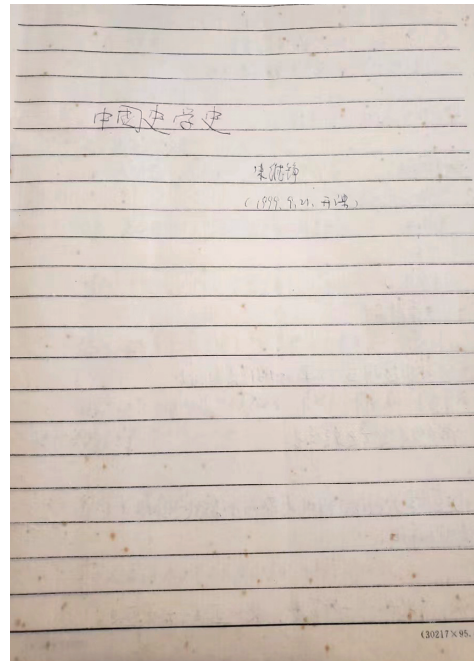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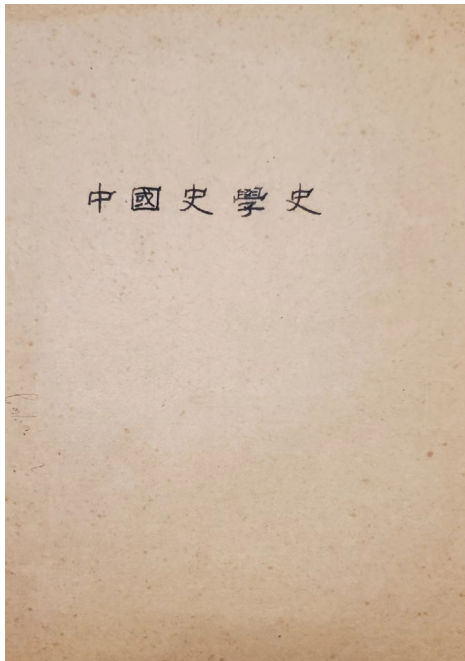
遺憾的是，學生時代的我，多年養成的聽課記筆記的方式是：只記自感有所心得、於己有幫助的部分，而自感自己熟知、不必記錄的內容則從略不記。這樣就帶來的一個後果，儘管我自以為聽課非常認真，但我的聽課筆記還是遺漏了不少內容，並不能包含朱先生講課的全部。我的整個聽課筆記顯得有些零碎，不夠完整、系統，再加上朱先生晚年授課，常常海闊天空、旁徵博引，上下穿插、前後互證，因此此次當我想要整理這份筆記時，儘管讀來還是倍感親切，也覺得內容豐富，頗有價值，但還是要費一番功夫進行整理綴合。我深信這份筆記或於學林不無裨益，同時在朱先生仙逝十週年之際，刊印出來，於紀念，於緬懷，都是合適的方式。

當初這門「中國史學史」課程是為復旦大學文科基地班開設的。我作為博士生、課程秘書，隨班全程聽課，並在課程結業考核過程中全程跟隨記錄。其時對朱

* 史應勇，江南大學人文學院教授。

先生獨有的口試方式也頗多受教。以下楷體字部分為朱先生授課筆記原文（引號內為朱先生原話），明體為筆者補闕或說明。因為原記錄有些零散，不做適當的說明與補闕，難免讀來不明就裏。同時，原記錄內容前後有些穿插錯亂，筆者重新做了整理綴合。需要說明的是，這份筆記只是我個人對於二十多年前求學於朱先生的一個緬懷方式，要想全面瞭解朱先生關於中國史學史的論說，可參由廖梅、姜鵬整理的朱維錚《中國史學史講義稿》（復旦大學出版社 2015 年出版）。

* * * *



本課主要參考書目：

- 《漢書·藝文志》
- 《隋書·經籍志》
- 《書目答問》
- 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》

（一）什麼是史？

「史，本指古代的一種官吏。史從巫出，故有『巫史』之說。巫掌接神，史掌記錄，記什麼神，從什麼方向來，何時來，何時去。所謂序神位，也是史的職責。後來史成為非常重要的官員。再後來史又變成記載的名稱」。

「最早的歷史記載，實際是一種宗教活動。史總體上屬於巫，二者有分工的不同。巫掌接神，史主序神位」。

「〈楚昭王問於觀射父〉是一篇極好的文章。楚昭王與孔子生活的時代相當，因此此篇反映的是西元前六世紀末至五世紀初的情況」。「〈九歌〉也是接神唱的」。

「史由為神服務變為為人服務，記神事向記人事轉變，由甲骨到金文，大概完成了這一轉變」。

直至今今天，「史」究竟是什麼，依然是每一個史學從業者值得注意的問題。

（二）關於「史學」

「歷史研究，首先要重視時間，然後是地、人、事。我們的祖先為把握這幾個要素費了許多精力」。

「史學的發生，首先是從歷史編纂學中來的」。

「史學的三个主要側面：一是回答是什麼的問題，二是回答為什麼的問題，三是解決史書編纂形式的問題」。

（三）史學史

「梁啟超首先提出要給史學修史」，並且，「梁啟超已經總結了中國歷史著作的三種主要的編纂形式：編年體、紀傳體、紀事本末體。所謂正史，都是紀傳體史書。當然，有的史書雖也是紀傳體，但沒有得到官方承認，就不是正史，或稱為野史」。

以往中國史學史的主要成就：

金毓黻《中國史學史》

李宗侗《中國史學史》

白壽彝《中國史學史》

「以往的諸多史學史都編成了歷史編纂學史」。「要注意歷史觀念史，它與歷史編纂學是互動的關係，因此二者結合起來才是完整的史學史」。「孔子就是用編纂

歷史的方法發表政見，這種作法對中國歷史影響很大，直至清末」。

（四）史學觀念的重要性

朱先生的「中國史學史」課，開篇就特別關注史書、史實以及編纂者主觀意見之間的相關性問題。

「史書的史實與主觀意見的區分，有的明顯區分，有的則不明顯」。從中國史學的源頭上說，「《春秋》究竟是否由孔子所作？是否是史書？」這就是一個相當重要的問題。「我比較傾向於孔子作過《春秋》」。「編纂形式與史觀的關係，這是史學史要考察的主要對象」。「司馬遷的《史記》被劉歆、班固放在『六藝略』中的『《春秋》類』，直到晉朝，史部才獨立出來」，這些事實，都與編纂者的主觀觀念的變化有直接的關係。

（五）關於《春秋》

「錢玄同最不承認《春秋》與孔子有關」。「王安石曾說《春秋》是斷爛朝報」。

「《春秋》中見不到作者以主體的身分出來說話，這不同於希羅多德的《歷史》，但「《春秋》特別強調『信』」，「《春秋》中時、地、人、事都是具備的，是一部比較完整的編年史」。

（六）關於《公羊傳》與《穀梁傳》

「傳，轉也，轉相發明也」。「《公羊傳》大概在景帝時寫成文字，《穀梁傳》大概在武帝時寫成文字」。「為什麼《春秋》寫到獲麟為止？相傳孔子對此事悲傷不已，因此而作《春秋》，故止筆於獲麟」。所謂孔子有王者之才、無王者之命之說，即來自《公羊》學。「《公羊傳》不是歷史，而是經學」。

「崔適是古史辨派的前輩，著有《史記探源》。他說《穀梁傳》是假的，是仿造《公羊傳》而成。至今此事還不好判定其是非」。

（七）關於《史記》

今天看來，「《史記·殷本紀》、〈夏本紀〉70%是正確的」。

「司馬遷的『究天人之際』之說，明顯帶有職業的痕跡以及董仲舒的痕跡。司馬遷自己說他曾向董仲舒、孔安國請教過。董仲舒、孔安國都是有學問的，無論其

價值判斷如何」。

「太史令是御前首席占星官，這是司馬遷的正式職務，而且他做得非常出色」，經他提議並參與編撰，才有了漢代著名的《太初曆》的誕生。「因為此曆法好，而使得漢武帝頒布此曆時改元『太初』。直至今日，陰陽合曆的『農曆』，仍一直以此曆為基準。司馬遷完成此曆後，認為他已經明白了天人之際是怎麼回事，這就是所謂『究天人之際』」。

「歷史不斷在變異，古與今不同，這種變異到底是怎麼回事？司馬遷不再滿足於《春秋》的水準，他提出了『天運』的概念。天處在不停的運動中，其變異是有週期性的，最小的週期是三十年，最大的週期是五百年，三個五百年合成一個更大的週期。這一套理論集中反映在《史記·天官書》中」。

「司馬遷言其《史記》成書後是要『藏之名山，副在京師』的」，但《史記》的命運並不好。「朝廷一直嚴格控制《史記》的流傳」。《史記》「本來還有〈景帝本紀〉、〈今上本紀〉，後來沒有了，據說漢武帝對〈今上本紀〉非常不滿意，『削而投之』」，但他沒有將《史記》全部銷毀。「司馬遷出獄後還升了官，作了中書令，因此說，漢武帝還沒有發展到後來那些帝王那樣」。

「大概在漢元帝時，《史記》已在外朝流傳」，且「不斷有人續補《史記》」。《史記》共「一百三十篇，其中有十篇是後人補的」。現在知道的續補《史記》者如褚少孫，「他在元、成之際作過郎，大概有機會看到相關資料」，現在《史記》中的〈武帝紀〉、〈三王世家〉、〈龜策列傳〉、〈日者列傳〉等幾篇就是由他續補的。再如「〈三皇本紀〉，是由唐朝的司馬貞補寫的」。

（八）從《漢書》的修纂到南北朝的史學

「班婕妤一度非常受成帝寵幸，於是整個班家得寵。當時劉向、劉歆正在整理宮廷藏書，後來將抄錄的所有宮廷藏書送給了班家，於是又有很多人到班家借書，如揚雄就曾向班家借書，他的學問即由此而來」。

「班彪是班婕妤的姪兒，是班家第一個文化人，對歷史很感興趣，熟悉宮廷掌故。他曾續寫《史記》，寫到王莽時代，但其書名未能流傳下來，後人稱其為《後傳》」。

西漢晚期，人們對於改朝換代的事特別關心，也為此憂心忡忡，當時也發生了一系列與此相關的事件。如「哀帝曾自己禪讓給自己，後來又改回來了。哀帝

死後，王莽當權，然後就學周公，輔佐平帝。平帝死後又選了孺子嬰，王莽作了攝皇帝，後來又製造了許多讖書，又有許多人上書請求他自立為帝，最終改國號為『新』¹。

「王莽是要推行一系列的社會改革，包括土地改革、賦稅改革等等。他的改革被冠以『社會主義』的名號，胡適就有這樣的說法。其實就是要平均。王莽還關心祖國邊疆的統一。他還頗有點科學頭腦，發明過一種飛行器（墨子）¹，還解剖過屍體，是人體解剖學的始祖。……」沒有想到的是，「全國上下都反對他，於是赤眉、綠林起義爆發了，王莽落得眾叛親離，最後死於漸臺」。

當時「劉秀等人都依附於劉盆子名下。劉秀自稱漢武帝的九世孫」。

這一系列人事、王朝的劇烈動盪事件，「需要說明」，這促使班彪續寫了《史記》，「終筆於王莽。想必他是寫了一部帝國的興亡史」。

「東漢以後，班彪成為文化貴族，而且是新王朝的辯護論者。其長子班固，次子班超，女兒即班昭」。

「班固的《漢書》是中國第一部王朝史、斷代史。它修正了司馬遷的紀傳體形式，創造了斷代史的記載形式，並有自己的觀念在其中。這種史書編纂形式一直沿用到清朝」。

「班固在服喪期間發現他父親班彪有《漢書》的書稿，於是加以修訂、續寫。當時曾有人告發他私修國史，後來得到了皇帝的認可，這其中有班超的功勞。漢明帝命班固先寫光武時期的雲臺二十八將，寫得不錯，於是就讓他將《漢書》修完，並讓他作蘭臺令史。此官職專門負責編纂東漢開國以來的史事傳記。從此，史家變成了史官。後來此官職工作地點由蘭臺遷至東觀。東觀的人員通稱史官。起先這一工作由個人接受任務，兼職，後來變成專職」。

東漢朝廷所開設的這種專門用於史書編撰的工作機構及其場所，「在後來的南北朝也曾設置過，稱史館。史館工作人員通常被稱為著作郎，其助手稱為著作佐郎，其中的有些人仍然是兼職。與此同時，朝廷關於歷史著作的審查制度也建立了起來，由一些高級官員負責此項工作，並由他們確定哪些人可以入《傳》，哪些人不可以。有些人即使允許入史，又有褒貶的問題，即如何評價其人。因為『史』已是『國史』，故人物評價的標準也就只能是權力者的標準。評價帶有強烈的主觀

¹ 朱先生解釋說，此種飛行器的製作，用的是墨子的方法和傳統。

性，權力者的尺度即是評價的依據。其實當初司馬遷已經覺察到，修《春秋》實際也是一種主觀評判。這樣就出現一個問題，歷史編纂本是一件好事，有了史館，更為工作提供了方便，《唐會要》中有關於史館的制度規定，如規定宰相要記日記，地方官要按時彙報情況，等等。這比私人修史顯然有優越性，但它失去了研究的客觀性，還要接受嚴密的審查，有些人可以依託權力篡改歷史，史家的個人抱負無法實現，於是大多數史館成員並不負責任。官僚化的結果，就是使不少人開始混飯吃。劉知幾曾說：『許多監修國史者指手劃腳，意見又不統一，十羊九牧。』又曾說，史館中的同僚，整天互相牽制，『含毫相視，頭白可期，汗青無日』（編按：劉知幾原文作：「每欲記一事載一言，皆閣筆相視，含毫不斷。故頭白可期，而汗青無日。」）。這就是史館制度官僚化以後的弊病」。

「在這樣的史館制度下，所謂正史的編纂，完全受朝廷的控制。但這並不能覆蓋所有的史學編纂工作，社會上還是有人對歷史感興趣，特別是漢魏六朝時代。當時的文論相當發達，如曹丕的《典論》、劉勰的《文心雕龍》等，史學比文論的發展差一些，但還是有人關注了歷史，而且歷史的變換提供了大量作文章的素材，也有人希望用歷史展現自己的文學才華，於是前朝的歷史，就有不同的記載出現。這一時期王朝更迭特快，一個人連續服侍三個王朝成為常事。這樣他本人就是掌故的體現，於是非官方的史書大量出現，如《晉書》有十八家。對於歷史的認識角度也就呈現多元化，史書的風格大不相同，有的只為了展現文才，因此史學價值就有所欠缺；有的人寫歷史，目光並不在往古，在現代」。

這種史學編纂的相對活躍，在南方表現得更為突出。「南方對於中國傳統的認識也與北方不盡相同」。「同一段歷史出現不同的記載。對前代史書的注解也相繼出現，比如裴駟的《史記集解》，裴松之的《三國志注》。裴松之生活在東晉末至劉宋時期。他發現了許多與陳壽所寫有所不同的記載，於是他就把這些內容記錄下來」。這種增補注解原書的修纂方法，「來源於經學」。「裴松之的注分量遠超過《三國志》原文，大致是原文的十倍。他引用的書有二百一十種之多。這些書今天絕大多數已看不到了。我們只有依靠他的注」略知其一二。

同時代的北方，史學則更體現受禁錮和受控制的傳統。「在北方，崔浩編纂拓跋氏歷史的事則頗值得關注。拓跋氏的社會形態還比較落後，在進入中原以後仍處於比較原始的狀態，還沒有自己的文字。因此要書寫他們的歷史，就得靠他們的傳說。崔浩就把這些內容以史書的形式記載下來。這樣的史學編纂形態，是否有譏笑

拓跋氏的動機？我們並不知道。但有人告發了崔浩，說他別有用心，於是就有了一場大獄，崔浩及其同黨統統被抓、處死。此後，漢族才真正算被征服了。於是之後很長一段時間，為北魏修史就成為一個忌諱。之後也就形成了一種對史官進行控制和干預的傳統。這種忌諱與控制，在魏收編纂《魏書》時表現得非常明顯。《魏書》是著名的穢史。魏收的人品極低劣，中央文件都由他起草，是第一筆桿子。他撰寫《魏書》時，高歡是有過交代的」。

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的史學，還有一個重要的內容，就是四部分類法的確立。「四部分類法一直沿用到民初。這個分類法的意義，不在於其是否合理，而在於史部的獨立」。

三國時期魏國秘書郎鄭默據皇室藏書編成《中經簿》，雖因原書散佚而無法睹其概貌，但它卻奠定了晉代「四分法」產生的基礎。西晉武帝時的秘書監荀勗根據《中經簿》編成《中經新簿》，確定了古代圖書的四分法：甲部：六藝及小學等；乙部：古諸子家、近世子家、兵書、兵家、術數；丙部：史記、舊事、皇覽簿、雜事；丁部：詩賦、圖贊、汲冢書。可以看出，此時的四分法已見後世四部分類法之雛形，甲部類「經」，乙部類「子」，丙部類「史」，丁部類「集」。到了東晉初，著作郎李充編《晉元帝書目》，他把原先四分法的順序進行了調換，將史籍更為乙部類，諸子更為丙部類。這便形成了後世分類法中以「經、史、子、集」順序排列的定則。

（九）關於隋唐時期的史學

隋朝設立史館，其實是繼承了北朝的傳統。

「《隋書》的『志』，實際是梁、陳、北齊、北周、隋五代的史志」。

「關於玄武門事變，考證最好的是陳寅恪的《唐代政治史述論稿》」。這一歷史事件，「按照傳統是不容的。因此這成為唐太宗的心病。於是他重修《晉書》，他自己擔任監修」，還親自為《晉書》的〈宣帝紀〉、〈武帝紀〉、〈陸機傳〉、〈王羲之傳〉撰寫了四篇史論，「因此稱之為『御纂』。其中著重探討了立嫡、立賢的問題，以晉武帝、晉惠帝事為例，認為立嫡最終要看是否對國家有利。顯而易見，這說的是他自己的事，其實是說，為了社稷，他的這次政變也是合理的。這個調門定，五代史書的基調也就定也。《晉書》加上《五代史》，共六部。當時參與官修史書的年輕史官有名曰李延壽者，先前還編撰有《北史》和《南史》二部，雖本是

私人纂修，但後來亦被官方承認。這樣，所謂『正史』就增加了八種，即所謂初唐八史。這是當時意識形態的體現，其歷史為現實服務的目的性非常突出」。

關於歷史為現實政治服務的問題，在唐代，還當注意，「唐太宗把周公趕進了周武王廟中，把顏回抬起來。而到武則天時代，又開始批判顏回。孔門中誰最值得尊重？於是有了孟軻」。唐朝初年「把道教定為官方宗教，那麼，讀書人怎麼辦？讓他們都研究道教？那是不行的。於是朝廷就讓人修纂《五經正義》。這同樣是以『學』為『術』服務」。「南北朝時期北方的學與術較為分離，南方則二者結合得較為緊密，因此後來《五經正義》大部分都用南學。這一點，以往的經學史、哲學史都沒有說清楚」。

這樣的《五經正義》，自然會引起一些學者的反對，因為這影響了「學」的真實性，劉知幾就對《五經正義》表示過反對意見。「劉知幾屬於北方學派」。

「劉知幾從武則天時代開始，三入史館，曾參與纂修過《則天實錄》，在史館裏工作了二十多年，歷仕二主，即武則天與唐中宗。其實到他死時，他已歷仕四主。他本來很有自己的見解，希望修一部真的歷史，可總不能如願，監修大臣非常多，連門下省的公文抬頭都要求抄進史書中，根本談不上史料的選擇。在這樣的背景下，劉知幾寫了《史通》。《史通》開始撰寫在長安年間(701-704)。寫作的時間是一個混亂的歷史時代，是一個權力交替頻繁的時代，社會思想也比較混亂」。

劉知幾《史通》自敘曰：「其於史傳也，嘗欲自班、馬以降，訖於姚、李、令狐、顏、孔諸書，莫不因其舊義，普加釐革。但以無夫子之名，而輒行夫子之事，將恐致驚末俗，取咎時人，徒有其勞，而莫之見賞。所以每握管歎息，遲回者久之。非欲之而不能，實能之而不敢也。既朝廷有知意者，遂以載筆見推。由是三為史臣，再入東觀（原注：則天朝為著作佐郎，轉左史。今上初即位，又除著作。長安中，以本官兼修國史。會遷中書舍人，暫罷其任。神龍元年，又以本官兼修國史，迄今不之改。今之史館，即古之東觀也）。每惟皇家受命，多歷年所，史官所編，粗惟紀錄。至於紀傳及志，則皆未有其書。長安中，會奉詔預修唐〔疑當作『國』〕史。及今上〔中宗〕即位，又敕撰《則天大聖皇后實錄》。凡所著述，嘗欲行其舊議。而當時同作諸士及監修貴臣，每與其鑿柄相違，齟齬難入。故其所載削，皆與俗浮沉。雖自謂依違苟從，然猶大為史官所嫉。嗟乎！雖任當其職，而吾道不行；見用於時，而美志不遂。鬱快孤憤，無以寄懷。必寢而不言，嘿而無述，

又恐沒世之後，誰知予者。故退而私撰《史通》，以見其志。」²

《史通》「分內、外篇。內篇嚴謹，主要考察的是歷史編纂學史。外篇則表現了作者較為活躍的思想，如〈疑古〉、〈惑經〉等篇。〈疑古〉、〈惑經〉主要懷疑的是孔子的經典。在他以前，已有人對孔子的經典提出過疑義，如王充在《論衡》裏就對東漢初年以前經學家的內容提出過疑問，只是王充的書在東漢這一代基本沒有發生什麼影響。王充是古文經學派的傳人，是班彪的學生，而班彪是劉歆的學生。王充的思想似乎很大膽……」。

「《史通》對中國史學的貢獻：1. 清算了《春秋》以來的歷史編纂學體系；2. 指出歷史編纂中的觀念可以懷疑，歷史著作中的觀念有正確，有不正確」。「從《史通》開始，人們開始注意史學批評的問題。中國史學長期缺乏一個自我批評的傳統，在這方面，史學不如文學。中國史學的有些反省隱藏在序文、贊、論中，是零散的，語言也比較含混」。

（十）關於「三通」

「唐太宗就開始重新規範禮制，到唐玄宗時代，有了《大唐開元禮》，官制也開始法典化」。《大唐開元禮》折衷了唐貞觀時期的禮制和高宗時期的《顯慶禮》，協調了對《禮記》經傳認識的矛盾，又有對於唐朝本朝新禮的吸收，以為定制。開元年間敕撰，共一百五十卷。

「唐代的官制基本沿襲北周」。《北周六典》的影響很大，它類似於一部行政組織法，《唐六典》就是在此基礎上形成的。

《唐六典》全稱《大唐六典》，也是玄宗時官修的一部法典，舊題唐玄宗撰，李林甫等注。實為張說、張九齡等人編纂。它是我國現存最早的一部行政法典，又稱「會典」，成書於開元二十六年（738），所載官制源流自唐初至開元止。六典之名出自《周禮》，原指治典、教典、禮典、政典、刑典、事典，後世設六部即本於此。

這一時代可稱為一個法典化的時代，《唐律疏議》也是在這一時期出現的。劉秩的《政典》也是在這一時期出現的。

《唐律疏議》，原名《律疏》，又名《唐律》，是唐高宗命人修纂的法律典籍，

² 此段補自〔唐〕劉知幾：《史通》（長沙：嶽麓書社，1993年），卷10，頁102。

也是東亞最早的成文法之一。它是唐朝刑律及其疏注的合編，為中國現存最古老、最完整的刑事法典，共三十卷。

《政典》，唐劉秩撰，共三十五卷，成書於開元末。仿《周禮》六官分職體例，采摭經史百家所載，記自傳說中黃帝至開元末年歷代典章制度建置沿革，並論其得失。全書已佚。見於《新唐書·藝文志三》著錄。

劉秩編纂《政典》，很可能是受了乃父的影響。

劉秩，字祚卿，劉知幾第四子。起家左監門衛錄事參軍，遷刑部員外郎。歷任尚書右丞、國子祭酒，坐事貶為撫州長史，卒於任上。

在此基礎上，有了杜佑的《通典》。

《通典》，中國歷史上第一部體例完備的政書，專敘歷代典章制度的沿革變遷，為唐代政治家、史學家杜佑所撰。全書共二百卷，內分食貨、選舉、職官、禮、樂、兵、刑法、州郡、邊防九門，子目一千五百餘條，約一百九十萬字，記錄了上起黃虞時代、下迄唐玄宗天寶末年典章制度之沿革，其中於唐代敘述尤詳。成書於唐德宗貞元十七年(801)，北宋時就有刊本。以後元、明、清各代有多種刻本流傳，其中以清朝乾隆武英殿刻「九通本」最為流行。

《通典》成書後，一度成為科舉考試的必讀書，特別是在宋代。因為宋代科舉要考策論，要用到這些內容。為此，宋代還出現了《通典節文》。如《四庫全書》中有《杜氏通典詳節》四十二卷，不知何人所編，據考證當為南宋人所編。其去取多有不可解者，見於杜佑《通典》，九門內汰其「兵制」一門，於「禮制」門內又刪去喪服之制等。蓋力求簡約，而略無義例者也。

而宋代又有鄭樵編纂了《通志》，是一部上起三皇、下迄隋代的綜合史料通史。鄭樵在《通志》中明確提出了會通的思想，主張修通史，強調史事、典章制度相依因的聯繫；主張史書應集古今之變，而反對割斷史事聯繫寫斷代史。他還主張用治軍那樣嚴整的「類例」方法來治學，認為史家修史要有獨到的見識。「《通志》中重點是二十略，紀傳部分則基本是抄襲」。

宋末元初馬端臨又編纂有《文獻通考》，也是一部典章制度史，共三四八卷。「引古經史謂之『文』，參以唐宋以來諸臣之奏疏，諸儒之議論謂之『獻』，故名曰《文獻通考》」(〈自序〉)。主要記載上古至宋寧宗時期的典章制度的沿革，門類較杜佑《通典》分析為詳，計有田賦考、錢幣考、戶口考、職役考、征榷考、市糴考、土貢考、國用考、選舉考、學校考、職官考、郊社考、宗廟考、王禮考、樂

考、兵考、刑考、經籍考、帝系考、封建考、象緯考、物異考、輿地考、四裔考等二十四門。所存資料較《通典》豐富，於宋代典章制度尤稱詳備。

（十一）關於宋代的史學

談到宋代的史學，繞不開的一個話題就是文人修史。「文人修史最大的缺點是重形式超過重內容」，對於論、贊等內容特別注意。早先撰作《後漢書》的范曄就是文人，「而且被稱為無行文人。才華是有的，但對嚴肅的歷史興趣不大。他的興趣就在論、贊等文字中。這在他給他侄兒的信中」說得很明確。

宋代「歐陽修、宋祁等人撰寫的《新唐書》也如此，還有《新五代史》，作者主要是借歷史發表自己的政治見解，比如裏面還講到五代時期的伶官、優官在宮廷政治中的作用，主觀性非常強，一路『嗚呼』下去」，以後《舊五代史》就被淹沒了，直至清代才又把《舊五代史》從《永樂大典》中輯錄出來。

「二十五史中有四部出自宋代，還有作為著名編年史的《資治通鑒》。司馬光真正發揮了《資治通鑒》主編的作用，其作用無人能取代。當然，這與他本人的具體處境有關。他不贊成劇烈的改革，尤其不贊成出於理財目的進行改革。慶曆年間范仲淹、歐陽修等人已經進行過改革，失敗了，二人被貶作外官。第二次改革，就是宋仁宗晚年已嶄露頭角的王安石在神宗時期主持的改革，他被任命為參知政事。他的改革主要是理財，在文化上則有疑經、改經等行動，對《五經正義》很不滿意。他想搞一套新的教科書，這就是《三經新義》——主要包括《周禮》、《詩經》、《尚書》三部，其中《周禮》最受他重視。其實《周禮》在唐代已有人懷疑其成書不是周公。王安石也不認為《周禮》就是周公致太平之跡，但他認為《周禮》主要內容是理財。司馬光反對把理財作為改革的主要內容，他起先就對慶曆新政不滿。他比王安石大兩歲，因為反對改革，表示願意修史，得到允許，用的經費由官方供給。纂修《資治通鑒》共用了十九年。他使用的一些助手都是真正的專家。他對初稿每篇都親自改定，非常用心」。《資治通鑒》「起自戰國，下至五代末。司馬光本是政治家，但不得志，因此《資治通鑒》的主線是政治，跟政治有關的內容都寫了進去，如戰爭、文化政策、民族衝突等。這部書完成後獻給了神宗，並由神宗寫了序。神宗認為這部書有備於治道，故賜名《資治通鑒》。它在中國史學史的影響，可以說是一個意外收穫」。

「後來南宋初李燾又作《續資治通鑒長編》」。

「朱熹非常不滿意司馬光對於正統、非正統無是非的觀點。他認為正統問題是一個大問題，比如司馬光認為，曹魏是正統，朱熹則以為要「帝蜀」。朱熹編纂有《資治通鑒綱目》，在史學史上很少有人對它進行研究。其實這部著作一度非常風行，因為朱熹的地位一度非常高，因此這部著作被說成與孔子作《春秋》一樣，稱之為『續麟之作』，其體例也是編年體，但有不一樣的微言大義在其中。朱熹的統學、道學觀點影響很深。一直到清中葉以後，中國人的歷史觀念才由批判開始走向反面，但那已是十八世紀晚期」。

朱先生認為，在早期的編年史代表作《春秋》、《左傳》之後，在漢末三國時代，出現了編年史的復興，荀悅的《漢紀》就是代表。「荀悅曾是漢獻帝的老師。他的《漢紀》編纂得很好，材料確鑿，在歷史上影響很大，司馬光就非常推崇荀悅，《資治通鑒》即以《漢紀》為模範編寫而成。三國以後，中國的史學編纂形式就一直兩種並行，一種是紀傳體，一種是編年體」。

當然，當初「紀傳體史書在某種程度上糾正了編年體史書的一些缺陷，但紀傳體的缺陷是以帝王為中心，司馬遷的紀傳體相對地注意了各個層面的人物，眼界較為開闊，如有〈貨殖列傳〉、〈遊俠列傳〉、〈烏鵲倉公列傳〉等，《漢書》就不行，還罵《史記》說貨殖、遊俠之傳有不良效應。歷史一但變成工具，就命運不佳」。

「後來的紀事本末體，可稱兼具了紀傳體和編年體的長處，又比較能夠避免各自的缺陷」。袁樞的《通鑒紀事本末》是其代表。「袁樞非常喜歡讀司馬光的《資治通鑒》，但苦於卷帙浩繁，希望所關心的歷史事件有一個完整的過程，於是就抄錄、合併、整理了二百多件史實，然後獻給宋孝宗，孝宗讀後也覺得不錯，這就是著名的《通鑒紀事本末》，其中的小標題每每表達了袁樞的歷史見解」。

「紀傳體以人為線，編年體以時間為綱，紀事本末體則以事件為目」。

（十二）關於元、明以後的史學史

遼、金、宋史，直至元末才有人著手編修。「脫脫一邊考慮與紅巾軍的戰事，一邊主持修史，因此這三部史書修得很差」。

「二十四史中最蹩腳的一部是《元史》，由宋濂等人修撰。以後不斷有人提出重修《元史》，如錢大昕」。

再後來，《實錄》都屢屢被修改，修改前朝《實錄》成為傳統，明朝的《實錄》不用說，「清朝的雍正、乾隆等《實錄》，一直到清末還在修改」。「清朝的軍

機處完全是皇帝的私人秘書，與明朝的內閣又有所不同，其人選的官位很低，行走低，學習行走更低。在這種情況下，要保持歷史記錄的真實性就大有問題，有好多私密的事，連六部尚書都不知道。軍機處進一步剝奪了內閣的權力，完全不受行政程式的限制」。當年明朝調選內閣成員已經開始不按程序辦事了，再後來「內閣也變成虛設。清朝則有過之而無不及，軍機處只有五、六人。尤其雍正，把國家權力完全與個人獨裁結合起來」。

「從此以後，官方記錄越來越不可信。於是有了野史與筆記，即民間人士所編寫的歷史。這裏面保存了許多官方史書中所沒有的東西。後來清朝的野史也衰落了，原因是文字獄。後來的野史大多是些讀經、讀史的心得，當然其中有一些與當時歷史有關的內容」。

（十三）關於中國史學中的夷夏問題

朱先生無論在自己的史學史課程中，還是在他的文化史課程中，都非常強調中國歷史上的夷夏問題、民族問題。這也是他多年來在史學認識中頗有創見之處。這部分內容雖然朱先生未能系統講授，但每講到相關問題時，均有申發，時出新見。

早期的「所謂華夏文化，其區域其實很小，只限於黃河中下游地區」。

夷夏問題該如何看？「這是一個古老的問題」。

「漢族的概念，其實出現很晚，它與漢朝的概念不同」。

「由東漢末至隋朝的四百年間，南方主要由原有中原的大族統治。這裏有原來的土著，即兩漢時期所謂南蠻。到這一時期，這些土著有一部分與中原貴族結合了，還有一些則南遷到更南的地方」。

「北朝時，『漢兒』還是鄙稱」。

「魏收為南人立的《傳》曰『島夷』。沈約為北人立的《傳》曰『索虜』。其實都在利用族類的概念，抬高自己族類的地位」。當初「孔子的這種思想意識就很強，所謂『夷狄之有君，不如諸夏之亡也』」。而「族類的意識在分裂的時代表現得特別明顯」。

「《孟子》最早成為官方承認的教科書是在金朝」。

「朱熹強調正統。可誰才是正統？」在中國歷史上，講正統，就必然與夷夏問題發生關係。因此，「朱熹特別強調夷夏之辨是必然的」。

「清朝對夷夏問題非常敏感。清朝的滿洲人一直實行內滿外漢」的政策。「當然

後來的反滿者不限於漢人，其反滿的原因在於滿人的腐化，但表現出來的是民族意識」。

「夷夏之別由族類觀念變成文野之分，這在十八世紀之後的中國，是很流行」的觀念。

「說元朝不尊儒，那是不對的。忽必烈曾被封為儒教大宗師」。

「清朝也尊儒，但只要他批准的那一種儒」。「康熙曾說，真理已被朱子講完了，現在關鍵在實踐這些真理」。

康熙很有興趣「瞭解域外的知識。那批傳教士有幸到了康熙身邊，希望他改宗基督教。康熙還真的曾經想做這些事，還很認真地與大臣們討論過。當然，討論這些與意識形態的優劣沒有關係」。

（十四）中國史學中國家疆土與版圖的問題

中國的疆土與版圖的問題，也是朱先生史學見解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。這部分內容朱先生也未來得及寫成專門著作，但在相關問題的討論中，時常涉及到的零星見解，也非常重要。

「『中國』，是一個不斷拓展的概念」。

「中國的統一是一個漸進的過程。漢族何時形成？至今不好確定，但可以確定，自西元二世紀到六世紀，是與此問題相關的非常重要的一個時期」。

「王莽很關心祖國邊疆的統一問題」。「王莽時代」，其實就國家統一程度說，「比西漢晚期更統一」。

「越南，在東漢以後就一直中國的藩屬」。

「唐朝時期，蒙古草原還沒有納入中國的版圖之內」。

「日本的沖繩島則一直是中國的領土」。

「臺灣正式進入中國的版圖在清康熙時代，並不在三國時代」。「新疆設省，一直到光緒年間才完成」。

中国史学史讲义稿

宋维铮 著

廖梅 姜鹏 整理



復旦大學出版社